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8.03.01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品格论析^①

刘晓玲, 蔺宏涛

(湖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2)

摘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具有人民性、民族性、包容性、实践性和时代性的先进的理论品格。充分领会和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品格,不仅在理论上有助于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质属性及其内在联系的研究,而且在实践上有助于进一步推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品格;人民属性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8)03-0089-08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建设什么样的国家、打造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始终是党和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为此,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战略任务。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和推动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广泛弘扬。党的十九大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科学判断,重申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发展任务,并给予了一系列新的重大战略部署,这也对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提出了更深层次的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特殊的生成背景、形成基础和价值诉求,被赋予了人民性、民族性、包容性、实践性和时代性的理论品格。这些理论品格决定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是理论自信的关键因素”^①。因此,客观考察和全面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品格,既是深化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质属性及其内在联系的题中之义,也是推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之需。

一 鲜明的人民性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反映理论品格的基本

要素,也是理论本身是否体现人民属性的核心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所形成的重要价值观念,体现了尊重人民意志、维护人民权益、促进人民幸福的根本价值目标与基本价值取向。由此,人民性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本质特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它的价值主体具有人民性。价值主体是价值观念的提出者、选择者和创造者,反映价值观念的阶级属性。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批判了鲍威尔自我意识错误观点,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②,从而确立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重大科学论断。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观点在列宁领导俄国革命的具体活动中得到进一步的阐发,“人民群众自己创立了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相比较而言,尽管近代中西国情迥异,但毛泽东从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经验中总结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认为只有人民才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教育高级干部要切实关心群众生活,并说明这样深入

① 收稿日期:2017-12-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7ADJ001);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YBA514)

作者简介:刘晓玲(1964-),女,湖南华容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①《中国理论何以自信》,《人民日报》,2015年4月24日第7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4页。

工作才能够得到“群众的同情和谅解,再大的困难也是能够克服的”^①;改革开放取得成效后,他对群众的作用高度肯定,认为改革开放中许多东西如乡镇企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都是群众提出或发明,并称赞这是“群众的智慧”。本世纪初,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历史征程中,胡锦涛强调:“人民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②，“全国各族人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③。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再次明确了牢牢把握并坚持人民主体地位。2013年11月,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谈到人民主体性时说: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的“力量源泉”,要紧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中,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突出强调“人民中心”的价值立场,即“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④。此外,我们党还强调,我们的国家建设是全体人民共同的事业,我们的国家发展过程也是全体人民共享成果的过程。从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人民属性还表明了社会劳动成果归谁享有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的发展成果不属于不劳动者,而是属于创造劳动成果的人民群众。2013年3月,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中指明:要使发展的成果更多且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要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人民群众的价值观,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作用和历史价值在其中得以充分体现,由此证明了人民群众是这一核心价值观的价值主体。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它的价值目标具有人民性。在共产党人的价值视阈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坚持这一基本原理,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利益放在

首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利益给予集中和正确的价值表达,强调其“根本着眼点和价值指归是最大限度地增进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⑤。早在1978年12月,邓小平就强调,增加群众的实际利益,“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⑥。此后,邓小平又反复地谈到更具体的指标,即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是党制定政策的依据。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要求人们树立人民利益的观点和以人民群众为本的观点,强调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出现了深刻的利益分化。面对社会利益的非均衡增进,江泽民要求全党牢记一切事情都要顺应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做到“想问题、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要考虑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⑦。这些论述都表明,党始终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永恒的价值追求。而且,将人作为社会发展水平的根本尺度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重强调的内容,我们党将其通俗地表述为人民群众生活的幸福感、尊严感和获得感。党的十八大后,我们党在改革中更加突出人民立场的价值追求,习近平严肃指出:推进任何一项重大改革,都要“站在人民立场上把握和处理好涉及改革的重大问题”,都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⑧。在十九届一中全会的讲话中,习近平强调要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使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一种评价标准,这一价值评价同样具有人民性。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不能离开评价活动。从人们认识事物的角度看,它也是认识事物属性的重要层面,是衡量活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9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22页。

③本书编写组:《胡锦涛同志“七一”重要讲话学习辅导》,中国言实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④《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7页。

⑤姚红艳:《人民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特征》,《道德与文明》2012年第6期。

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

⑦《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69-470页。

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54页。

动对象需要达到的效果的价值尺度、准则和界限。因此,我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民性的判定也包括对其评价标准的考察。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价值评价标准都是人民性,结合党的群众工作和活动,江泽民将这一标准作了高度概括,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我们工作价值的最高裁决者”^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承接了这一重要思想,它强调一切方针政策,都应以提高人民生活为最高标准,以人民满意为根本准则,强调要提高人民生活,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例如,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联系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思考,突出强调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判断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最高价值标准。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更是明确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评价各项工作的硬标准。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面对新的世情国情党情,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了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强调“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②是这一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时代越发展,我们党对人民主体地位的认识越牢固。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胡锦涛在科学发展观理论中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命题,实现了思维方式由“物本”向“人本”的转向,提升了以人民利益为重的价值观,强调重新树立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念,指出“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③。十八大后,我们党不忘初心,坚定信念,继续带领人民为崇高理想奋斗,指出通过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目的,从而更加突出人民性的评价标准权重,正如习近平所言,“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④,检验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要看两个方面,即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

二 浓厚的民族性

民族性是一个比较概念,表征事物的民族特色属性。对于价值观而言,不同的民族因民族的地域、文化、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阶级状况的差异,必然呈现出一定的民族性。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机理和思想内涵分析,它积淀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最深层的价值追求、人文情怀和道德观念^⑤,契合了民族心理,表达了民族理想,因而被赋予浓厚的民族特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美好追求。追求统一安定、繁荣昌盛的美好生活,渴望并期盼均平自由、公平正义的社会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共同民族心理和精神愿景。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经历了深重的百年灾难,但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人民的民族独立观念觉醒,要求国家富强的观念兴起,期望生活幸福的观念增强。例如,鸦片战争后,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经世派提出了启迪中国人自强和独立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口号;太平天国运动则提出了均田免粮等要求社会平等的口号;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曾提出建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和发展的社会实践,对社会主义再认识,提出了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共同富裕”“民主政治”“依法治国”“和谐社会”等目标。其中“共同富裕”经历从改革开放初期的部分先富、最终共富,到南巡讲话中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时完全确立,以及十四大至十七大党的坚持和发展;在面临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人民收入差距拉大的现实情况,党的十八重申:“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⑥。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及关键的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的重要价值观念,是中国共产党高扬的一面旗帜。1979年3月,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中强调,没有民主便没有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习近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

①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70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94页。

④《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0页。

⑤陈秉公:《传统价值观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若干理论研究》,《理论探讨》2016年第4期。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

民主的极端重要性：“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之一，十八大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十九大强调“深化依法治国实践”。十六大以后，胡锦涛深刻分析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强调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并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之后，2012年11月，习近平在党的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继续阐述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强调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要求必须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的创造活力。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秉承和寄托了中华民族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精神追求，并将这些美好的追求整合后书写在它的丰富内容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阐扬了中华民族的高尚道德。中华民族一贯重德、尚德，提倡“德为先”“尊道而贵德”，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与人为善等道德观念为个人修身之道与成事之基。中国先贤孔子，一生的活动就是追求伟大的德性，流传后世的《论语》的主体精神便是道德的作用。鉴于德性修养对人教化的重要性，宋代大儒朱熹更把《礼记》中的《大学》篇单独拿出，列为“四书”之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传统道德充分学习吸收并努力发扬光大，一方面，它将古代注重人生和伦理的“德”发展成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道德。其中，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主旋律，是团结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由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具体分为三个层次，即无私奉献、一心为公，先公后私、先人后己和公私兼顾、不损公肥私，分别是共产党员、先进分子，具有较高的社会主义道德觉悟的人和普通公民应努力达到的道德目标。因此，习近平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属性层面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

德。”^②另一方面，它把传统意义的朴素的“道”与社会主义制度充分结合，上升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条道路坚持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同时坚持推进其它方面的建设；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既重视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也强调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由此表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括尽管没有直接言明它的各项德目，但其实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道德，阐扬了传统道德体系的内定精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守了中华民族的家国意识和民族情怀。深厚的家国意识和民族情怀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突出特点。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格局里，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发展中逐渐形成并发展了完善的家国意识和民族情怀，现代人仍然津津乐道的“贵和尚中”“厚德载物”“爱好和平”“精忠报国”“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心怀天下”“艰苦朴素”“仁爱孝悌”“诚实友爱”“克己奉公”“勤劳勇敢”等观念，就表达了中华儿女对国家的热爱、对民族的担当、对社会的奉献和对他人的关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承载着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和全体人民自古以来的精神追求，它思考、描绘着我们的国家、社会、公民的前途和未来，引领着我们建设一个体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特征的现代化国家，构筑一个包涵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要素的进步社会，培育亿万持有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观念的有德公民。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回答了要建设怎样的国家、建设怎样的社会、培育怎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因此，作为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共同的思想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大限度地展现了中华儿女坚守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信念的家国意识和民族情怀。

三 博大的包容性

包容性，简言之，就是求同存异、欣赏理解、亲和宽容、开放发展的思维，在价值导向上能够更多地体现利益公平、机会均等、规则公正、分配公平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55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等共享方式以及人或事物间共存共赢的关系。在世界近代史上,西方国家正是凭借极强的包容性文化,才成就众多领域的辉煌。在全球化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更需要包容性的文化。因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包容性,包容品质也成为核心价值观的突出特征,其在价值导向、文化来源和具体要求三个方面给予了充分体现。

从价值导向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求同存异,化繁为简,将位于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的价值目标有机融于一体,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定、具体要求和方向。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国家、社会、个人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国家、社会 and 个人的价值理想、价值愿望及价值追求融会统一,实现了三者建设的良性互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价值观既体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担负的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两大历史性任务,又全面涵盖“五位一体”建设总布局,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物质、精神、社会以及生态文明有机统一的多维建设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价值观是建设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所要求的,是社会建设理论的价值升华,深刻揭示了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的价值取向,体现了全社会共同追求的社会秩序理想。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价值观是我国长期进行公民道德建设中有关公民道德行为基本价值标准的高度概括,它是每个公民应当具备的基本价值观念、道德立场和每个人在国家、社会、职场和家庭中应该遵守的道德准则,也是我国一直以来大力提倡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的直接诠释。三个层面的目标内在有机融合,在维护社会的和谐有序运行中不可或缺。如此,通过三个层次理念的联系贯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实现了国家理想、社会导向、行为准则方面的高度统一,而且实现了国家、集体、个人在价值取向上的高度统一,兼顾了三者的价值理想和价值追求,体现了极大的包容性。

从文化来源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博采众长,中西融合,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

基因,又吸纳、借鉴了近代西方文明的价值理念。世界上各民族创造的文明都是人类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它们不受社会制度的束缚和制约,都值得人类尊重和珍惜。处于社会文明高地的时代,东西方文明的灿烂成果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理应得到更好的挖掘和体现^①。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汲取了思想道德中的醇厚营养,提炼出热爱祖国、敬业爱岗、诚实守信、友爱善良的价值观念,组成了人民群众熟悉了解的公民个人价值准则。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们也认识到,文化发展永远都是一个动态、开放、变化的系统,它只有与其他文化交流、沟通、借鉴和取长补短,做到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才能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深情指出,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交流互鉴使文明充满生命力;当人们秉持包容精神,所谓的“文明冲突”就不存在,人类文明和谐就可实现。因此,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破除思想桎梏,抛弃极端思维,鼓励人们积极学习、研究西方国家积累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建设成果,并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大胆吸收了被人类珍视和我国人民追求和向往的人人平等、人人自由、公正和法治至上等价值观念,从而展示了人类价值观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极大包容性。

从具体要求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力求全面、系统,做到各个层面都提出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规范化要求。我国是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不同的群体和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利益要求和认识水平对社会的发展做出预期,反映了人们的意愿和要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早已包含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内容中,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是党和政府制定各项具体工作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而社会层面包含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要求,是对当代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规律的科学揭示,符合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已逐渐成为我国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和现代文明社会建设的根本价值遵循。在国家、社会

^①孙伟平:《“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6期。

层面之外的个人层面,着重以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要求揭示了公民个人成长发展规律,符合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观,是每个公民都应该具有的良好道德修养和必须恪守的基本道德规范。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核心价值观已然包含的国家、社会、个人层面的价值规约三层关系,需要正确对待和处理,做到平衡和兼顾,即我们既强调个人服从国家的利益,遵守社会的共同规则和秩序,在服务社会中寻求个人价值诉求的正当实现;又强调尊重个人的价值诉求,不断满足个人的基本发展需求。因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包含了上至国家、下至个人的价值理想、价值准则和价值要求的综合体,较为全面、系统,被赋予相当大的包容性。

四 彻底的实践性

来源于社会实践的理论才能被称之为正确的理论。同时,把正确的理论运用到实践中让人民群众自觉自愿遵守和践行的理论才能真正发挥功能。因而,实践性是理论生成与发展的基础,是理论鲜活的特征和内在品质,也是理论富有生机、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和源泉。通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地分析研究,我们可以得出,彻底的实践性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又一特征和属性,其不仅在来源方面,而且在成长轨迹和培育践行中都显示了实践特征^①。

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源看,它是我国一系列的社会历史实践活动的概括和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人民开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过程既是经济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过程,也是塑造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过程。20世纪五六十年代,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的土地改革运动,谋求近代中国走上工业化之路的有计划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加强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的宣传教育,使得富强、民主、文明这些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在刚刚起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中开始生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坚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马克思主义态度,通过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新鲜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调整了整个国家的发展重心,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

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在党的领导下,我国从处于初级阶段的最大国情和时代要求出发,探索和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先后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精神文明、共同富裕、依法治国、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社会公平正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四个全面战略、五大发展理念、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战略等。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伴随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人民群众的自由平等观念日益增强,民主法治意识迅速提高,对公平正义的呼声也愈加强烈。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些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就在推进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强民主与法治建设的实践中形成。而作为公民个人层面价值准则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也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重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促其向纵深发展的积极成果。

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长轨迹看,它植根于国家经济发展活动和国家与社会治理各领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文化产品,具备生产与再生产机制,它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紧密联系。与此相应,只要人们将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分离,它就被剥夺了生产与再生产的能力,成为无所适从和空洞苍白的躯壳。国家治理是复杂而又庞大的任务,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功能出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根据变化的实际情况,对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执政能力、执政体制机制和国家管理体制机制进行优化,达成国家与社会的和谐稳定与持续发展。2014年2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了核心价值观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性,即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正常运转、社会秩序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亦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在这一体制机制的转变过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价值体系标准,支撑与保障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同时,作为解决国家治理中社会问题的社会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对国家治理中的社会问题,诸如社会中的矛盾化解、福利完善、

^①郝娜,李嘉谊:《论自由核心价值观的三重属性》,《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1期。

公平维护、民生改善保障等发挥积极作用,有效推动着社会有序和谐发展的过程,已成为塑造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支柱。从近年的情况看,由于我们在经济政策制定时融入了核心价值观,经济发展形成的政策导向、利益机制和社会环境成为助推其发展的外在力量;由于在依法治国、执政、行政的法治实践中贯彻了核心价值观,法律法规已转化为核心价值观进行生产与再生产的重要保障。

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践行看,它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紧密相关。价值观的问题,关键在于落实,而这种落实必须走进人的日常活动。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逐渐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全方位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及党的建设之中,转化为一系列治国理政的具体政策、制度,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重要的实践活动。在党的领导下,各级单位和组织,通过接地气的宣传教育、榜样人物的示范引领、思想方法的实践养成,以及相应的配套政策、制度和规范实施,使核心价值观逐渐入法入规,融入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例如,我们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在基础、高等、职业技术以及成人教育教学中,搭建了包括课堂教学、课外辅导、社会实践和校园文化的育人平台,实现了核心价值观的“三进”(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又如把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落实到经济发展实践和社会治理中。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企业、经济组织在确立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和措施,出台经济社会政策,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着重强调做到守法经营、公平竞争、诚信守约、承担社会责任,形成了有利于弘扬核心价值观的良好环境。法律是推广主流价值的重要保障,法律权威能够增强人们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因而,2016年12月,我国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推动把核心价值观在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和依法治理中贯彻落实。社会各个行业,社会各系统等亦结合各自职能,逐渐建立起落实核心价值观的规章制度,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具象化、制度化、法律化和体制化。此外,核心价

值观还被融入市民公约、村规民约、学生守则、风俗习惯等行为准则之中,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规范,使之成为人们日常工作生活中日用而不觉的基本遵循。实践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紧密相关,内在地具有“改变世界”的实践理性品质^①。

五 强烈的时代性

人们的社会生活是具体的、现实的,属于一定的时代,因而反映社会生活的价值观总是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基于时代发展的洪流,关切时代呼声、反映时代特征、顺应时代潮流、解答时代问题,折射出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担当;同时,它面向未来剖析问题,前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始终做到与时俱进,因而,强烈的时代性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品格。

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时代问题的回应。2009年11月,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秋季进修班开学典礼讲话中阐明了何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简言之,它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相结合,使之“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不断吸收新的时代内容、科学回答时代课题”^②。在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科学合理地回答了时代提出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强调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观必须与时代同行,符合时代的发展要求并体现当今的时代诉求。改革开放40年,因处于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我国社会在大踏步前进的同时,各种文化主张纷纷浮出水面,出现了与社会主义主流价值导向相悖的现象:部分领域思想混乱、主流意识弱化、极端个人主义严重,部分人群信仰迷失、道德真空、价值失落、价值混乱、价值冲突;部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缺失、党的意识淡化、宗旨观念淡薄、奋斗精神不振、道德行为不端,这些过去未曾遇到的问题尽管还不是社会的主流,但已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和影响了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动摇了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而且,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变型、社会结构的调整变动、利益关系的重组改造,各种价值观念和社会思潮更加活跃、更加注重话语权争夺,也促使人们思

^①关雯文,吕立志:《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重理性向度》,《湖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61页。

想认识上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愈益凸显。就此社会现象的危害,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专门指出:现在我们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问题“病根”都在这里,如若“这方面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难以顺利推进”^①。作为先进文化的中国特色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拨开笼罩人们思想的重重迷雾,重塑社会主义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提高人们辨别和抵制错误思潮的能力,增强人们的价值观自信与价值自立,使社会主义的正确价值观成为整个社会信守的共同价值追求,成为人民群众的具体价值实践。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面向未来的科学思考。理论不仅要对时代问题进行回应,同时又“不能停留在对现有问题的解决和应对上,必须要有宏观和长远的洞见和视角,能够根据科学研究判定特定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剖析将来可能产生的问题和困境,寻找社会工作服务的对象和客体”^②。历史发展也表明,任何思想体系一旦自我禁锢、封闭自处,脱离社会生活,注定被人们抛弃;而与时俱进、关切时代呼声的思想理论,才能永久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被提出到践行的整个过程,都未脱离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这促使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得以不断同步更新并

成为社会成员树立道德情操的精神灯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价值理念,立意高远、思想深邃、视野宽阔,不仅立足现在,而且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高度进行观照,力图对中华民族未来命运科学思考和规划。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在这一战略新征程中,中国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存在于国家工作的每个方面和各个环节,如在经济建设中,投资增长乏力,一些行业产能过剩,一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地区和行业走势分化日趋明显,个别地方财政收支压力加大,金融等领域风险隐患增多;民生领域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紧迫的医疗、教育、养老、收入分配、食品药品安全、生产安全、城市管理等方面问题仍然较多,环境污染形势仍很严峻,有些改革和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一些领域的不正之风与腐败问题不容忽视。此时,只有用创新性的科学理论指导变革中的实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的宏图夙愿方能最终实现。从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经常体认和日常感知中,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在当下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很长时期都将发挥价值引领作用。

On Theoretical Characters of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LIU Xiao-ling & LIN Hong-tao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Being the concentrated reflection of the spirit of contemporary China,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has embodied the pursuit of common values of all people, which is of profoundly theoretical quality of affinity to the people, nationalism, inclusiveness, practicality and the times. A full understanding and analysis of the theoretical character of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can help not only contribute to the study of deepening the fundamental attributes and internal relations of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 theory, but also further promote to develop and practise the values in practice.

Key words: socialist core values; theoretical character; people's attribute

(责任校对 刘大禹,钟丽)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34页。

^②范时杰:《社会建设的治道变革:珠海社会体制的切面观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77页。